

东南地区早期海洋性聚落中的特殊类型

The Special Types of Maritime Settlements in Early Southeastern China

付琳 唐凯纯 Lin Fu Kaichun Tang

【摘要】先秦两汉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海洋性聚落存在两种特殊的聚落类型，即产业型聚落和贸易型聚落。产业型聚落的典型遗址有台湾澎湖七美岛的石器加工场、福建长泰龙津溪中游的石器加工场、浙江宁波大榭岛的制盐工坊等。产业型聚落多为资源指向型，资源种类、多寡和优劣的差别，是影响此类聚落发展和聚落形态的重要因素。贸易型聚落的典型遗址有广西合浦港汉代港口、泰国 Khao Sam Kaeo 遗址等。贸易型聚落多为区位指向型，特殊的地理位置、陆海运输条件的便利程度，是影响此类聚落发展和聚落形态的重要因素。另外，区内亦存在一些集产业、贸易、生活于一体的小型聚落，特点是产品产量有限贸易辐射半径较短。

【关键词】海洋性聚落 石器生产 海洋贸易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maritime settlements in southeastern China coast and Southeast Asia coast of pre-Qin and Han period, we find two special types of these settlements: the Industry Type and the Trade Type. The Industry Type of settlements includes stone tool processing places in Qimei Island, Penghu, Taiwan, an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Longjin river, Changtai, Fujian, and salt workplace in Daxie Island, Ningbo, Zhejiang. The Industry Type of settlements were usually resource-directed. The variety,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resources we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settlements. The Trade type of settlements includes harbors in Hepu, Guangxi of Han period, Khao Sam Kaeo in Thailand, etc. The Trade Type of settlements were usually location-directed. Location and traffic we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settlements. Besides, there were also small complex settlements that integrated the functions of industry, trade and living, which were low in the quantity of goods and with short radius of trade circle.

Keywords: Maritime Settlements, Industry of Stone Tools, Maritime Trade

在大陆沿海地区和近海岛屿开展考古工作时,对于海洋性聚落性质的认识颇为必要。在相关考古材料有所积累之后,尝试对不同性质的海洋性聚落加以类型分析,并找寻其分布规律,对将来的田野考古工作和海洋考古学研究均有意义。在我国,类似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时期晚段的海港、海防和海洋信仰方面,而关注于史前和早期历史时期的相关研究却较缺乏。本文以中国东南地区先秦两汉考古资料为主,辅以少量东南亚地区的相关资料,尝试对这一阶段几种性质特殊的海洋性聚落作初步讨论。

学者对于海洋性聚落性质的把握,通常多重视遗址环境背景和生业模式信息。然而,在更为宏观的视野下,特别是进入早期历史时期后,经济的产业化有时已经超越了为满足基本需求的日常生计手段,并开始与跨区域的贸易行为相关。本文不讨论广布于东南大陆沿海和近海岛屿的大量普通贝丘、沙丘类型的生活聚落,而关注于一些性质特殊的聚落类型及交流网络。在梳理与分析相关资料后,可初步提出两类性质特殊的早期海洋性聚落,分别为产业型聚落和贸易型聚落。

一、海洋性产业型聚落

我国东南地区早期的海洋性产业型聚落,大多是与玉石器加工相关的遗址。近几年来,宁波大榭岛史前制盐工坊的新发现也引人注目。总体来看,这种类型的海洋性聚落多是资源指向型的。资源种类、多寡和优劣的差别,是影响此类聚落发展和聚落形态的重要因素。现举几例加以说明。

(一) 台湾澎湖七美岛的石器加工场

七美岛位于澎湖列岛最南端。澎湖列岛所产石材主要是多气孔、易风化的矽质玄武岩,而七美岛则出产细致状的碱性玄武岩,其岩层厚度部分超过 40 米。在七美岛南岸、东岸与北岸,还有高达数十米的柱状节理玄武岩,可以提供非常丰富、优质且便于开采的石料。考古工作者在七美岛的南港、东湖、西北湾三处石器加工地点,发现有大量石制品,分别为块状石料、石核、石片、素材、石毛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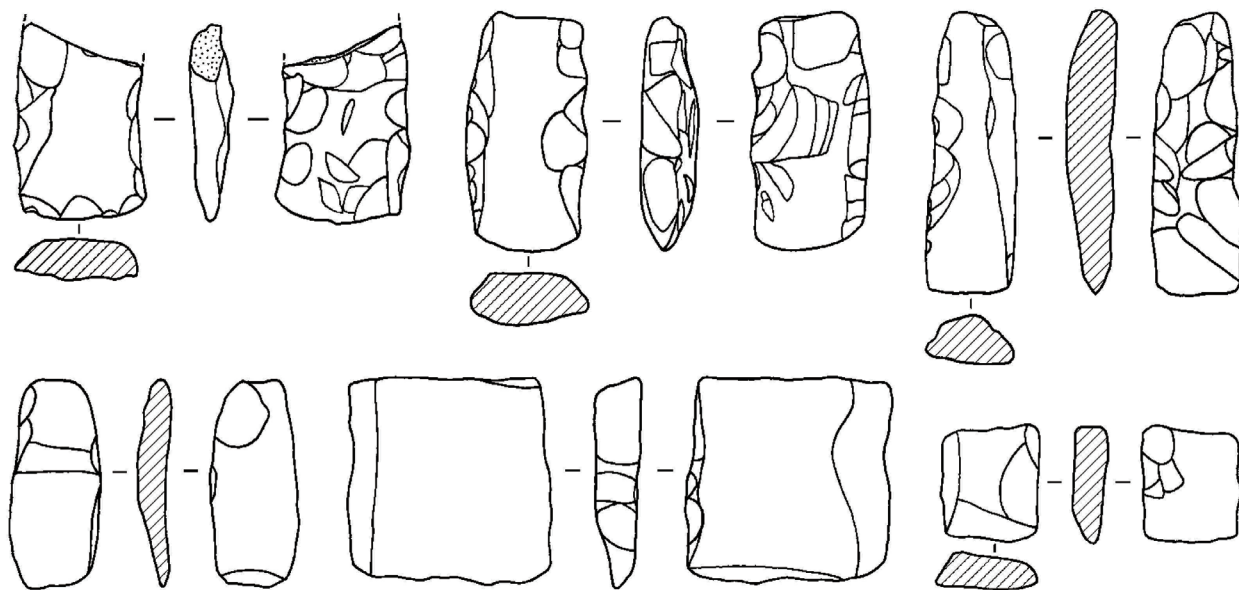
石残器、石子器和砥石等七大类,而几乎不见陶器和其他类别的文化遗物,显示出三处地点的功能非常单纯,即石器加工场^[1]。在三处地点发现制造的成形器物,仅有打制的斧锄形器一种器形,且未进行细致的加工或打磨,说明人群可能是将粗制的打制斧锄形器运至他地再行进一步加工,也有可能是运销到其他地区后再加工成当地需要的器形。

南港石器加工地点附近的南港遗址,是目前在七美岛上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生活聚落。南港遗址内发现有贝丘、墓葬等遗迹,陶器、石器 etc 遗物,并见大量鱼骨遗存。从采集贝壳标本的季节分析,南港遗址应是常年居住的聚落。遗址出土陶器可区分为本地制作和从台湾岛西南部输入的。石器主要是制作加工斧锄形器的工具、废品、废料,和少量磨制的斧锄形器成品。另发现两件以台湾闪玉制作的玉铤和玉凿。南港遗址年代大致在距今 4200 至 3800 年间,从遗址底层发现少量澎湖莖叶期陶片来看,其年代上限或可提早至距今 4500 年前后。

Barry Rolett 等学者通过 X 射线荧光分析及比较,指出台湾岛西南部的玄武岩石器均来自于七美岛。种种迹象显示,福建东山岛大帽山遗址所见玄武岩石器的石材可能也源自七美岛^[2]。七美岛到台湾岛西南部直线距离约 80 公里,到东山岛直线距离约 140 公里。臧振华认为七美岛玄武岩石器的制造,只代表台湾地区玄武岩石器贸易体系的一部分,而其中心应该在台湾岛西南海岸的某地,他们派遣专业工匠常年住在七美岛,进行玄武岩石器半成品的打制,然后将这些半成品及石材,运输到台湾岛的生产中心进行细加工,再进行台湾岛内的贸易^[3]。七美岛的石器加工地点和南港遗址是非常典型的,为开采并制造玄武岩石器而形成的史前海洋性产业型聚落。

(二) 福建长泰龙津溪中游的石器加工场

在东南大陆沿海地带,有较多和七美岛石器加工场性质相近的遗址已被发现。2010 年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对福建长泰县境内龙津溪中游的后厝山、覆顶金山、无林山、宫前门口山四处遗址



图一 福建长泰后厝山遗址出土的石锤毛坯

进行发掘^[4]。在这四处遗址中均发现了内涵基本相同的，属于浮滨文化阶段的石器加工场。在后厝山山顶发掘区出土石制品数万件，包括采集石料、剥片、加工毛坯等不同阶段的标本，反映了石器加工生产的多个环节。遗址内发现最主要的石制品为石片，从可辨识的毛坯观察，绝大多数终端产品应为石锤（图一）。尽管还见有少量石锤毛坯，但有可能是用石锤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制成的附属产品。这些石制品的原料基本都是玄武岩，经初步鉴定石料均来自该山体中的玄武岩块，为本地所产。遗址出土的石锤等石器加工工具则取材于龙津溪河畔的砾石。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处遗址中并不见大规模定居生活应有的遗存，种种迹象表明这些遗址的性质是商周时期浮滨文化人群临时性的、以石锤半成品制造为主的石器加工场。浮滨文化先民利用该地的玄武岩矿产制作石锤毛坯，再将其带到定居聚落进一步磨制加工成器。在这几处遗址内打制石锤毛坯的产量非常大，且产品类型单一，显然脱离了为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工具加工的家庭或家族小作坊范畴。以往在龙津溪中游调查、发掘的 20 多处浮滨文化遗址

中出土和采集石制品的内涵与后厝山遗址所见基本一致，很可能就是该地所产石锤的消费地。

浮滨文化作为粤东闽南地区商周时期颇为繁盛的土著文化，考古发现所反映出其日常生计中的海洋性因素已不甚显著，然而海洋性经济在浮滨文化中的地位可能不容小觑。无论在浮滨文化的墓葬形制、青铜兵器、石质兵器和陶器的部分特殊作风中，均显露出很多与中原晚商文化存在密切联系的线索。中原地区商文化大墓中所见的部分贝类，又明确产自中国南海。以海贝等海珍为主的贡赋贸易，或许即是浮滨文化与中原商王朝之间联系的一种重要媒介。如是观之，类似后厝山这种专业化的石器加工场出现在浮滨文化中不足为奇，其也可以作为一个海洋性产业型聚落的典型案例。

（三）中国岭南和东南亚大陆的石器生产聚落

在我国岭南地区和东南亚大陆，也有很多与七美岛、后厝山性质相近的遗址。西樵山遗址位于广东南海县官山镇，是一座古火山丘，山体主要由粗面岩、火山碎屑岩和石英岩构成。在东北部的火石迳等地点有燧石、玛瑙出露，

在西部的马鞍山及山顶的锦岩等洞穴有霏细岩岩脉。该遗址自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5],发现大量石器遗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是以燧石为石料的细小石器,常见小石叶、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石核,不过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它们是本地先民系统地开采西樵山燧石矿的产品。另一类是以霏细岩为石料的磨制石器或是待磨制的毛坯,主要器形均为有肩石器,包括斧、铤、铲等,其石料来源可确定开采于西樵山的霏细岩矿脉。经过长时间的开采,在西樵山形成了一系列古矿洞。现有研究表明,西樵山遗址是一处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以开采霏细岩矿产并制作有肩石器为主的大型采石场和石器制作场,周边地区许多遗址中出土的石器,都可能来自于此。

有肩石器作为史前时期岭南、东南亚大陆和岛屿地带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以西樵山石料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已见的开采情况分析,其生产产品的流通半径可能不容小觑,这需要我们今后在环南中国海区域的石器研究中给予注意。此外,在越南嘉莱省的 Ba River 上游发现 6 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加工场。据 Phan Thanh Toan 研究,这些加工双肩石器的工场在工序上有明确分工,已形成了标准化生产链条^[6]。这对我们未来的调查、研究也有一定启示作用。

(四) 浙江宁波大榭岛的史前制盐工坊

大榭遗址位于浙江宁波市大榭岛榭北盆地内,北面向海,东、西、南三面环山,遗址中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宋元三大阶段的遗存。从出土陶器类型分析,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大致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和钱山漾类型阶段。在遗址中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与生产海盐相关的盐灶群和大量形制单一的夹粗砂圆底陶缸和平底陶盆,为我国东南地区史前时代海盐的规模化生产找到了明确的考古证据^[7]。需要注意的是,海盐作为沿海地区可再生利用的资源,在寻找及确认此类产业型聚落时,除了考虑盐料易得程度外,考察遗址的日照、风力等环境因素及交通背景也很重要。大榭遗址史前制盐工坊的发现,显然会为今后华南、东南亚沿海及岛屿地区相似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提供重要

线索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海洋性贸易型聚落

史前时期的海洋性贸易型聚落,相对于产业型聚落而言性质更难辨别,通常只能依据多种来源地的舶来品或是货币汇聚一处,且本地产品有流通他地来加以推论。需要说明的是,在大陆性文化特别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三代至秦汉时期,也会表现出珍贵舶来品在文明中心汇聚,且来自中心的权威物品向四方辐射的现象。但海洋性商品贸易与基于政治地位差异的贡赋活动不同,海洋性贸易多为循环性的,在循环中某些特殊的节点,即是海洋性贸易型聚落的所在地。中国东南及东南亚地区秦汉时期的部分遗址,已明确显露出此种性质。若以类似遗址表现出的特征为基础,或许也可推断史前时期这一类型聚落的分布特征。目前来看,海洋性贸易型聚落多是区位指向型的,特殊的地理位置、陆海运输条件的便利程度,是影响此类聚落发展和聚落形态的重要因素。现举几例加以说明。

(一) 广西合浦的汉代港口

合浦是汉代岭南地区的重要港口,很可能是我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8],比较详细地描绘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路线。

合浦汉墓群位于合浦县城一带,分布面积约 68 万平方米,现存封土 1056 个,估计地下埋藏墓葬近万座。自 1957 年迄今,已考古发掘超过 1200 座汉墓。其中出土了大量与海外贸易相关的珠饰,及其他与贸易活动相关的遗物,主要有金饼、金珠、玻璃、石榴子石珠、肉红石髓、玛瑙和蚀刻石髓珠、水晶珠、绿珠石珠、琥珀珠、绿松石饰件、香料等,另有伴随商贸活动传入的陶壶和铜钹等非贸易品。根据成分分析,这些饰物的原料多是来自南亚、东南亚和

西亚,与中国本地所产不同,是贸易行为的结果^[9]。另外,合浦大浪汉城^[10]和草鞋村汉城^[11]两座城址的发现,也对合浦港在海丝贸易网络环节中的特殊位置,及其作为汉帝国最为重要的陆海贸易桥头堡的地位,据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二) 泰国 Khao Sam Kaeo 遗址

马来半岛是位于安达曼海和泰国湾之间的一条狭长陆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海洋贸易给这一区域带来了深刻影响。许多商品从原产地港口出发,必须经由马来半岛才能运送到东方或西方。海洋性贸易促使港口城市快速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泰国湾南部、马来半岛东海岸的 Khao Sam Kaeo 遗址。该遗址由建在河岸的四个平顶小山丘组成,山丘之间是村庄地面,共发现 17 处堤坝或城墙,显示出较强的防御性特征。在这处遗址中出土来自越南北部的东山铜鼓,来自中国西汉时期的陶器,以及刻有印度梵文姓名的婆罗米文印章,证明这处遗址是秦汉时期沟通南亚、东南亚与东亚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市^[12]。

值得注意的是,本地亦生产硬石质地的串珠,尤其是玉髓或玛瑙串珠广泛流行。有学者认为在该地成为此类饰物重要生产区的过程中,很可能有来自印度的工匠参与。该地玻璃串珠的制造同样也受到印度工匠的影响。这些均是海洋贸易行为的副产品,制造类似串珠的原料运输便捷,加工工序并非十分复杂,少量的熟练工匠即可将此产业带到港市。繁荣的海洋贸易,则将他们的技术和产品推广,同时也刺激了本地人群乃至内陆人群对外来物品需求的不断增加。通过对其他地区发现串珠的比较研究,表明产自 Khao Sam Kaeo 遗址的串珠曾销往越南和泰国的其他遗址^[13]。

(三) 越南中部沿海的沙莹文化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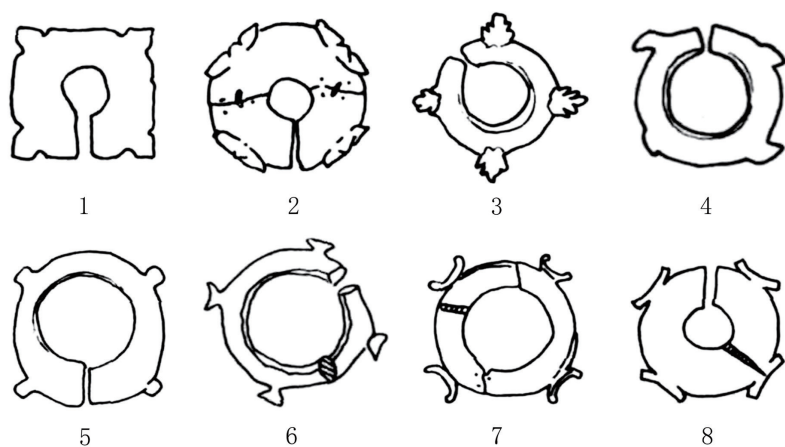
越南中部海岸包含若干个由长山山脉环抱的低洼地。发源于长山山脉的河流流经这些低地,加之海岸地区充沛的降水,促进了当地的水稻种植。沙莹遗址即位于这些沿海岸线的低地之间,附近至少还发现 40 处同期遗址,是越南中部海岸平原地区发现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沙莹文化的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石灰墓丘遗址为代表,瓮棺中主要随葬青铜器和铁器,及少量装饰用的珠子,

已体现出与外部的海上交流及联系。第二阶段是全盛期,使用带盖的大型瓮棺,随葬大量外来或本地的玛瑙珠、玉髓珠。至第三阶段,连接越南海岸和东亚与南亚的海上贸易线路兴起,沿着这一路线所进行的贸易行为不断增加,甚至跨越南中国海,到达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

在属于沙莹文化第二阶段的莱宜遗址发掘了 63 个瓮棺葬,以及有丰富随葬品的土坑墓。墓葬中发现的玉衣,由一万多个珠子串成,所用材料很多来自区外,如金、玻璃、玉髓、玛瑙、水晶和玉。部分墓葬中还发现汉式铜镜、青铜钵、五铢钱和王莽时期的铜钱,表明本区与汉朝之间的贸易交流。所见印度风格的玉髓珠,也指示出与南亚地区的贸易联系。沙莹文化人群通过海上航线与外界进行广泛商贸,在台湾岛东南部的兰屿、菲律宾的巴拉望岛、泰国中部的班东达潘和 U-Thong 等地均发现过沙莹文化的典型遗物。研究表明,沙莹文化装饰品的原料来自台湾岛丰田的软玉矿,这些玉石矿料经航运到达东南亚大陆,经过当地的作坊加工后成为各种耳饰,在环南中国海地区进行贸易。在沙莹文化的鼎盛时期,铁器在区内广泛应用,并与境外舶来的玻璃和玉石珠宝组成贸易品的核心内容^[14]。这一阶段沿越南中部海岸线存在一系列占据最佳地理位置的沙莹文化遗址,其性质可能与海洋贸易行为有很大关联。

(四) 环南中国海早期的台湾软玉贸易网络

在史前时期的环南中国海地区,用产自台湾岛丰田的软玉制成的两类形制特殊的耳饰在众多遗址均有发现。洪晓纯曾系统梳理公元前 500 年以来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中南部、泰国和柬埔寨等地长达 3000 公里海岸线附近台湾软玉耳饰的考古发现,指出东南亚地区很多遗址均存在生产类似耳饰的活动。有趣的是,产品的形制如此一致,说明在史前台湾岛软玉的贸易网络中,流动的商品不单是成规制的玉料,还有相应的技术和技工。而且,如以靠近台湾玉产地花莲的坪林、旧香兰等遗址作为这一网络的起点,其向南部的兰屿、绿岛,菲律宾巴丹群岛、巴拉望岛、婆罗洲北部、越南中南部、马来半岛,乃至柬埔寨的流通网络基本闭合。当然,从另外的方向,来自中



图二 环南中国海地区早期遗址出土的玉石耳饰

1. 越南冯原文化 2. 越南东山文化 3、4. 菲律宾巴拉望 Tabon 诸洞穴 5. 台湾卑南
6. 台湾兰屿 7. 广东曲江石峡 8. 广西平乐银山岭

亚地区的玻璃珠、硬石珠制品和技术乃至工匠则可能由马来半岛进入这一台湾玉的贸易网络，并一直流通到台湾本岛^[15]。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东南大陆特别是岭南地区，应当也在这一网络之中，早至商代石峡中层类型所见的玉石耳饰（图二）^[16]，晚至合浦汉墓中所见的玻璃、玉石串珠，均为明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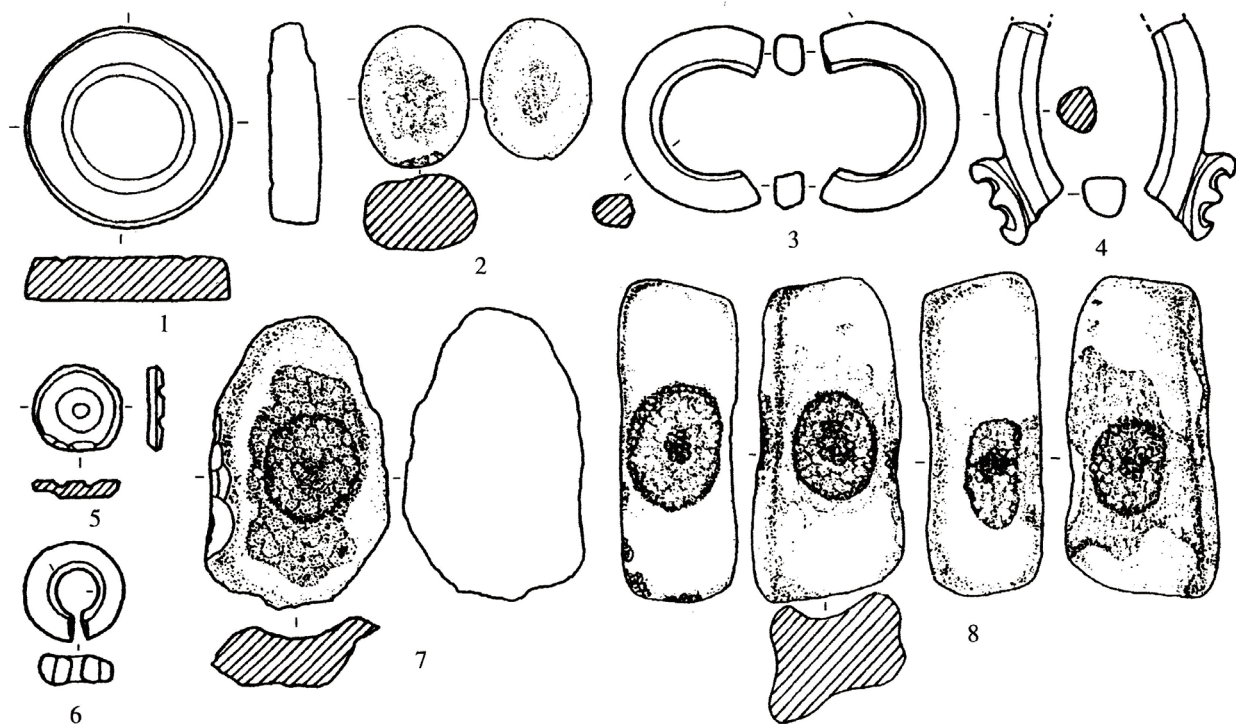
三、其他

在东南地区早期海洋性聚落中，存在一些集产业、贸易、生活于一体的复合型聚落，相对于前两类聚落而言，它们的特点是聚落体量较小，产品产量有限，贸易辐射半径较短。颇为典型的案例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周时期部分聚落之间的玉石块饰与印纹硬陶器的交换贸易。

涌浪遗址位于香港“新界”屯门西部海岸，地处珠江口东侧。涌浪遗址第二期遗存发现有由红烧土块、陶片、炉算、灰屑、灰烬等组成的炉灶遗迹。另外，还发现一些柱洞，但找不到柱洞的布局规律，难以确定房子的结构。在涌浪遗址发现墓葬十余座，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人骨均已朽蚀，葬式不明，随葬器物有陶器以及石环、玦、镞等。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呈黑、灰黑和红褐色，器形包括方口罐、釜、支脚、纺轮、炉算等。泥质陶以灰陶为主，器形包括罐、壶等，流行矮圈足作风。纹饰以绳纹为主，几何形印纹陶占有一定比例。拍印叶脉纹的泥质陶器十分流行，有些还在器身饰以数圈附加堆纹。石器种类和数量十分丰富，有长身镞、斧、有肩石器、钺、铲、凿、镞、网坠形器，

还有石环和石玦的成品、半成品及废料^[17]，说明在居住区内存在石块和石环饰品的生产加工活动。这一遗址可能与珠三角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深圳赤湾、鹤地山下层，珠海后沙湾二期，南海鲮鱼岗，三水银州等遗址之间存在玉石块饰和几何形印纹陶的交换贸易。

白芒遗址位于香港大屿山北岸，位于海湾内的沙堤上，两侧山岗环抱。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等单位对其进行发掘^[18]。遗址可分四期，第一期和第二期为史前遗存。第一期出土有石饰品，石料包括水晶和片麻岩两种。石核、石片、石饰毛坯、玦与芯等代表生产加工各个阶段的遗存均被发现。第二期也出大量石器，以石块和石环占大宗，亦存生产和生活用器（图三）。所见石饰品的石料主要是片麻岩与石英，见代表生产加工各阶段的遗存。以上均显示出聚落内存在制作玦、环饰品的作坊特征，其中最丰富的是以石英岩为原料的产品。据黄韵璋研究，白芒遗址除见零星的河卵石以外，大部分石料均为山料，系从本地石英岩脉直接开采^[19]。白芒遗址内发现有与居住相关的遗迹。第一期发现了砾石构筑群、灰坑群、烧土堆群及土坑墓1座。第二期发现了砾石构筑群、灰坑及红烧土、烧火堆等。其中一组砾石群，围置成一个石圈，直径约4米。砾石圈内堆积的土色与四周土色有显著差异，石圈内部及外围附近，陶片和石器分布相当集中，并发现炭粒，



图三 香港大屿山白芒遗址出土石器

1、5. 石英块芯 2. 砾石石锤 3、4、6. 石玦、环 7、8. 凹石

可能是房子结构的一部分，表明遗址内存在定居活动。在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出土了大量夔纹陶器（双“F”纹）以及饰有其他几何形纹样的硬陶器，从形制分析有可能与广东博罗横岭山墓地出土者同源。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博罗横岭山墓地发掘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302 座^[20]。由于当地土壤呈酸性，有机质难以保存，葬具与人骨均未发现。随葬陶器以泥质陶为大宗，质地有软、硬之分。纹饰以拍印的席纹、戳印的篦点纹和刻划的弦纹多见，另有夔纹（双“F”纹）、重圈纹、云雷纹、方格纹等，以及 200 多种刻划符号；器类有罐、釜、瓮、簋、甗、豆、壺、尊、盆、杯、器盖、器座等，其中以罐最多，流行圜底或凹圜底。另有原始瓷器百余件，以豆占绝大多数。横岭山墓地所见青铜器以兵器和工具为主，有戈、矛、短剑、镞、斧、刮刀、铤、凿、靴形器等，礼器有鼎、乐器有甬

钟，显然和北方的周文化已建立了某种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墓地出土了包括玦、管等在内的小件玉石饰品百余件，这些小件玉石饰品应该就是在香港地区类似白芒遗址二期聚落内生产的。可以确定的是，在横岭山墓地中发现的大量几何形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应为本地烧制，在博罗梅花墩遗址即发现了烧制类似产品的龙窑^[21]，产量水平可以满足与白芒二期聚落进行玉石玦饰交换贸易的要求。

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周代香港地区的涌浪二期聚落和白芒二期聚落，依托本地的玉石资源，在居住区附近生产加工玦、环等小件玉石饰品，并与邻近的大陆同期聚落进行几何形印纹硬陶器的交换贸易，也可以作为一类特殊的海洋性聚落形态。在香港蒲台岛等地发现的以云雷纹等几何形印纹为素材的石刻岩画^[22]，也为揭示这种产品相对固定的贸易交换行为提供了重要线索。

注释

- [1] 臧振华：《澎湖七美岛史前玄武岩石器工业与其贸易体系》，《台湾史前史专论》[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59-82页。
- [2] Barry Rolett, We-chun Chen, John Sinton. Taiwan, Neolithic seafaring and Austronesian origins. *Antiquity* 74: 54-61, 2000.
- [3] 臧振华：《澎湖七美岛史前玄武岩石器工业与其贸易体系》，《台湾史前史专论》[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59-82页。
- [4]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福建长泰县龙津溪中游商周时期石器制造场》[J]，《考古》2016年第5期。
- [5] 参见易西兵主编：《西樵山遗址考古研究》[M]（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 [6] Phan Thanh Toan. System of Stone Axe-Making Workshops in the Upper Area of the Ba River, VIETNAM ARCHAEOLOGY No. 10, 2015.
- [7] 雷少、梅术文：《浙江宁波大榭遗址》[J]，《大众考古》2018年第2期。
- [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中华书局，2005年。
- [9] 熊昭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的考古学探究》[J]，《中国文物报》2017年5月5日第005版。
- [10]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大浪古城址的发掘》[J]，《考古》2016年第8期。
- [11]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8期。
- [12] [新西兰] 查尔斯·海厄姆著、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译：《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M]，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29-231页。
- [13] Bellina, B.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ard stone ornaments, Vic. BC. -Vic. AD.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Paris, 2007.
- [14] [新西兰] 查尔斯·海厄姆著、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译：《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M]，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29-231页。
- [15] Hsiao-chun Hung, Peter Bellwood. Movement of Raw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ed Goods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after 500 BCE: From Taiwan to Thailand, and Back. 50 Years of Archaeology in Southeast Asia: Essays in Honour of Ian Glover, River Books, 2010.
- [16] 千小莉：《从凸形环看环南海区域土著文化的交流》[J]，《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 [17]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涌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7年第6期。
- [18] 邓聪、商志、黄韵璋：《香港大屿山白芒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7年第6期。
- [19] 黄韵璋：《环珠江口玦饰制作工艺探讨》[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 [20]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M]，科学出版社，2005年。
- [2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县博物馆：《广东博罗县园洲梅花墩窑址的发掘》[J]，《考古》1998年第7期。
- [22] 秦威廉著、石钟健译、彭劲松校：《日渐明明的岩刻争论》[J]，《江西文物》1990年第1期。

作者：付琳 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唐凯纯 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